

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—1949

互对楼房若干幢，分设总账房、会客厅、总校处、绘图处、裱书处、钞书处、画格处、描子处，以及照相房、火轮印机房、印稿房、校书房、磨石处、积书处、堆纸处、装订处”等<sup>①</sup>。

### 三、早期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的规模及其意义

早期的民族机器出版业，既是文化产业，也是上海早期民族工业的一部分。它们是在外资工业的诱导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。早期上海外资工厂的出现，不仅吸引私人资本转而投资近代工业，同时也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设厂提供了方便。首先，外资工厂冲破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对私人资本自行设厂的限制，为私人投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。其次，外资机器印刷出版业在技术、管理知识等方面为华人民办机器出版机构提供了借鉴。如果“华洋阻隔”，则“虽中土技巧之士，莫由凿空而谈”<sup>②</sup>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它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必须面对外国商人的强烈竞争。所以，继点石斋之后的华资同文书局、拜石山房、蜚英馆石印书局，投资都较大。同文书局“购备石印机十二架，雇佣职工五百名”<sup>③</sup>，同年设立的拜石山房能与点石斋、同文书局成鼎立之势，盖应与两者规模相当。前面提到的蜚英馆有那么精细的分工，其规模可想而知。当时有人说上海“现在每一个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人”<sup>④</sup>。徐新吾《上海近代经济史》中估计到1894年民族印刷业的投资为10万两<sup>⑤</sup>，以同文书局、蜚英馆、鸿文书局为2万元，其余为1万元计，根据是同文书局1893年失火时损失1.5万元而得出。事实上，据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说，这个数目是同文书局得到保险赔偿的金额，实际损失当不止此数。这样较大规模

① 《申报》1887年1月13日。

②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奏稿，卷九。

③ 贺胜鼐：《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》，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》，第270页。

④ 《北华捷报》1989年5月25日。

⑤ 徐新吾、黄汉民主编：《上海近代经济史》，第57—58页。

的投资，不仅使之在与外商的竞争中站住了脚，而且使他们所印书籍质量还有胜过外商之处，清人姚觐元在述及同文书局时说的“历观全局用西法，而仍以墨印，较之点石斋胜多多矣”<sup>①</sup>就是一个明证。这种较大的规模，不仅使我国民族出版业得以生存，而且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凡的发展态势，这对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也不无裨益。我国后来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民族出版业逐步发展，到20世纪初取代教会出版业和官办出版业而成为出版业的主流，与此皆不无关系。

民办机器出版业的发展，也吸收了都市大量的人员就业，从上面的叙述中，仅同文书局就有500人，其他几个大的机构也都有100人至200人来看，单是这几个机构已吸收了几千人就业，如加上铅印出版机构和过去一些老书肆的扩大，吸纳的人数当更多。就业机会的增多，更能吸引外地人大量来沪，以后来沪的大量移民，虽原因各别，但沪上大量的就业机会始终是都市永恒的魅力所在。另外，这些出版机构大量翻印中国传统古籍，“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”<sup>②</sup>，大到“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图书集成》、《全唐诗》等，下至应试、干禄之所需”，确可谓“汗牛充架之巨帙”<sup>③</sup>。而且这些书价格便宜，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益处非小。还有一些原版书已散佚，由之翻印而得以保存，这也为今后的科学和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① 《清代日记汇抄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41页。

② 孙毓棠：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一辑下册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1009页。

③ 汪敬虞编：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第二辑下册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967页。